




[意] 维柯 著

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
维柯论人文教育

Vico

张小勇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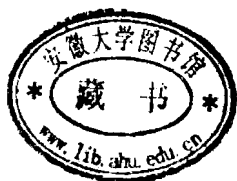
 上海人民出版社


[意] 维柯 著

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

维柯论人文教育

张小勇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维柯论人文教育 / (意) 维柯(Vico, G. B.) 著；张小勇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7-208-10537-9

I. ①大… II. ①维… ②张… III. ①高等学校-人文科学-素质教育-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4711 号

责任编辑 任俊萍
封面装帧 王小阳

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

——维柯论人文教育

[意]维柯 著

张小勇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6.25 插页 4 字数 218,000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537-9 / G · 1496

定价 35.00 元

中文版序言

意大利全国研究理事会(CNR)下属维柯研究中心(Centro di Studi Vichiani)特别满意地欢迎维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维柯论人文教育》是其中第一卷。加姆巴迪斯达·维柯(Giambattista Vico)是意大利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张小勇在从事翻译工作的这几年中,跟我们有过多次合作。我们最初认识他是在2005年10月,那时他来到那不勒斯参加“维柯与东方: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国际研讨会。他在发言中解释了他在将维柯的拉丁文作品译成中文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标准。^[1]后来他获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奖学金,从2008年至2009年整个学年做客我们的研究所。他泡在我们的图书馆,跟我们的研究人员时常见面探讨,既探讨单个术语的意义和翻译,也探讨维柯思想的总的解释。

维柯研究中心是在皮埃特罗·皮奥瓦尼(Pietro Piovani)的倡议下,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团体,于20世纪60年代末成立于那不勒斯的,其后继者先后有福勒维奥·特希托雷(Fulvio Tessitore)和朱塞佩·卡恰托雷(Giuseppe Cacciatore)。在80年代初成为意大利全国研究理事会的分支机构。维柯研究中心的主要宗旨曾是,现在也仍然是推进自由而开放的维柯思想研究,自由是指不拘于成见俗套,开放则是面向不同的解释,但前提基础是要对文本从语文学角度来精心释读。正是出于这个目的,维柯研究中心自成立之日起承担的首要的也是基本的任务就是,开始并完成维柯著作的系列批判版。该版本的初级目标是仔细严谨地对照朱塞佩·费拉里(Giuseppe Ferrari)在19世纪和后来由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与福斯托·尼科里尼(Fausto Nicolini)在20世纪提供的文本。克罗齐和尼科里尼的版本作为拉泰尔扎出版社(Editore Laterza)的宏伟系列“意大利作家”(Scrittori d'Italia)其中之

一，出版于1914—1941年间，它提供了一个有意简化和现代的维柯著作版本，其目的是将维柯从被意大利传统诅咒的文化隔离中拯救出来。在使被传统忘却的这些作品便于阅读的过程中，克罗齐和尼科里尼将其定格在一个漫长不休的鲜有逐字逐句忠实于原文的传统里。他们大量修改标点符号，翻改拼写形式，插入方便阅读的段首，不拘小节地干涉文本。所有这些都属于一个特别的语文学时期。感谢维柯研究中心的工作，人们可以认为，这个时期如今已经彻底宣告结束，同时已经被更为可靠的标准所代替。

迄今为止，已经按照批判版预定的总计划出版了八卷^[2]，其中包括维柯未曾出版的主要著作《新科学》1730年版，紧随其后的是2012年即将出版的最为人所熟知的最终版本1744年版的批判版。这几卷书不仅在语文学规则，而且在外语翻译问题上引起了活跃而持久的争论。维柯翻译自19世纪后半叶就开始增长，而后逐渐扩散到新的国家和地区^[3]，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越来越多地利用了那不勒斯研究中心的批判版本。

除了批判版工作，还有其他重要的编辑创举，特别是“维柯研究”(Studi Vichiani)这一研究文库，以及杂志《维柯研究中心学报》。这些编辑活动总是追随维柯的教导，即总是使语文学层面与哲学层面保持平衡。

这个立场在2001年由于有了新的动力而得以保持并发展。那年，维柯研究中心并入意大利全国研究理事会下属现代科学与哲学思想史研究所，从而不仅在学术地域上，而且在学术领域上都得到了扩展。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帮助和网络的利用^[4]，这些年里我们同全世界关心维柯思想的学者们加强了关系，维柯研究中心总是给予他们特别的高度关注。维柯研究中心永远有兴趣来了解维柯思想的传播，也跟来自欧洲、美国、南美洲的学者们保持紧密联系，但在最近十年来，这些联系要比以前来得越来越紧，特别是跟远东国家的联系，首先是跟中国的联系。汉学家马西尼(Federico Masini)帮助我们跨越了这个对我们来说

仍未探索的区域所带来的语言障碍。他在200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他阐释了中国维柯研究的起源，特别还有最近的研究方向。他表明，对这位那不勒斯哲学家的兴趣已经扩散到许多中国大学校园，从北京到上海，从武汉到延安。^[5]维柯研究中心每隔五年就编纂一部《维柯文献索引》，包括全世界出版的维柯本人和关于维柯的著作。其中就介绍了在2001—2005年间出现的十篇中文评论，而在2006—2010年又有两篇。^[6]正如马西尼所强调的那样，也正如在“维柯与东方”学术研讨会上所显现的那样，维柯在中国以及其他邻近国家所引起的兴趣似乎有着不同起源。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和英美学术界的研究，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对这种兴趣起了作用。实际上，维柯思想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批判笛卡尔所表述的西方理性主义，同样因为这个原因，维柯才被借来代表东西哲学的碰撞点。

2005年的研讨会自然而然体现了发展意大利和中国维柯学者之间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7]值此机会，意大利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们将维柯完成的重要的独创性工作凸显出来，以便将东方也融入他的历史理论、社会起源理论和语言理论当中。而东方世界在维柯的时代，在意大利还只有很少的资料，由旅行者和传教士传递过来。但从亚洲来到这里的学者们向我们揭示了在他们国家的维柯研究是多么丰厚。中国北京大学现任历史系主任，历史学教授高毅描绘了中国的西方历史研究的一般画卷；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陆晓禾研究员用中文和英文写过许多维柯研究作品，她在会上解释了参考研究这位那不勒斯哲学家的著作，如何能够在下述方面起到根本作用，即重建中国哲学基础，并使之有能力对当代社会问题做出回答；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张隆溪强调了维柯遗产在跨文化研究和东西方沟通上的重要性。在该研讨会上，另一位汉学家萨巴蒂尼(Mario Sabattini)深化了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朱光潜的形象，后者是将维柯《新科学》译成中文的第一人，该译本最初出版于1986年。

朱光潜并没有从原文意大利文，而是从英译本来翻译《新科

学》，^[8]后来维柯作品的翻译也大多是以英译本为基础转译的；只有陆晓禾在从里昂·庞帕(Leon Pompa)选编的《维柯著作选》(*Selected Works*)英译本翻译的同时，参考了意大利原文。相反在日本，首先是上村忠男(Uemura Tadao)直接从意大利文和拉丁文翻译了许多维柯作品，韩国的Cho Hanook在翻译《新科学》时也是如此。张小勇的新的译作之所以非常重要，正是因为它们是最终直接从原文将维柯作品译成中文的系列翻译的开端。维柯是一位思想复杂、难于解释的哲学家，他的作品也充满了细腻色彩，而这只有熟知他的语言才能充分深入地理解。因此，张小勇的翻译满足了深入了解维柯文本的急切需要，而这也是维柯研究中心所开展的批判版工作的基础，同样也是对18世纪那不勒斯思想家编纂的原始文本的尊重。由于我们研究所提供的电子复制光盘，张小勇才能在那不勒斯留学期间，以及回到中国之后有幸参考利用这些原始文本。

在这部珍贵的译著中所包含的维柯作品从语言角度来看特别复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使用了保罗·克里斯托弗里尼(Paolo Cristofolini)编的《维柯哲学著作选》(*Opere filosofiche*)所提供的维柯拉丁文本，因而避免了通过意大利文转译的障碍。这展现了一种正确的方法论立场，当然也应作为典范，但首先是使得更多的、广泛的读者大众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厘清，什么是久存于我们心中的“维柯问题”。我们祝贺张小勇获得成功，并祝愿他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意大利维柯研究中心

2012年2月

注 释：

[1] D. Armando, F. Masini, M. Sanna (eds.), *Vico e l'Oriente: Cina, Giappone, Corea*. 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Napoli, 10—12 Novembre 2005), Roma,

Tiellemedia, 2008, pp.339—342.

[2] G. G. Visconti(ed.), *Le orazioni inaugurali. I—VI*, Bologna, Il Mulino, 1982; C. Pandolfi(ed.), *La congiura dei principi napoletani*, Napoli, Morano, 1992; M. Sanna(ed.), *Epistole. Con aggiunte le epistole dei suoi corrispondenti*, Napoli, Morano, 1992; G. G. Visconti(ed.), *Varia. Il'De mente heroica' e gli scritti latini minori*, Napoli, Guida, 1996; M. Sanna(ed.), *Le gesta di A. Carafa*, Napoli, Guida, 1997; G. G. Visconti(ed.), *Minora. Scritti latini storici e d'occasione*, Napoli, Guida, 2000; P. Cristofolini, M. Sanna(eds.), *La scienza nuova 1730*, Napoli, Guida, 2004; G. G. Visconti(ed.), *Le iscrizioni e le composizioni latine*, Napoli, Guida, 2004.

[3] 关于《维柯与东方》(*Vico e l'Oriente*)出版以前的情况,卡恰托雷的报告仍然有用(参见 G. Cacciatore, A. Stile(eds.), *L'edizione critica di Vico: bilanci e prospettive*, Napoli, Guida, 1997),还有五年一期的“维柯研究文献”(Bibliografia vichiana)。

[4] 自 2009 年起,现代科学与哲学思想史研究所(ISPF)创立了以“维柯门户”(Portale Vico)为名的门户网站,汇集维柯作品及维柯研究资料:<http://www.giambattistavico.it/>。自 2004 年起,又开始出版电子杂志 ISPF-LAB:<http://www.ispf-lab.cnr.it/>。

[5] F. Masini, *Vico in Cina e la Cina in Vico*, in *Bollettino del Centro di Studi Vichiani*, XXXIV, 2004, pp. 269—282.

[6] D. Armando, M. Riccio, *Settimo contributo alla bibliografia vichiana*, Roma, 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2008; A. Scognamiglio, *Ottavo contributo alla bibliografia vichiana*, Roma, 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2012.

[7] D. Armando, F. Masini, M. Sanna(eds.), *Vico e l'Oriente: Cina, Giappone, Corea*, cit.

[8] Cfr. Zhu Guangqian, Poscript, in *New Vico Studies*, V, 1987, pp.186—188.

译者序言

维柯生平与著作

维柯(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是意大利近代以来最具创新性的伟大思想家。他1668年生于意大利,终生都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度过,终生守着那不勒斯大学的一个修辞学教职,终生都生活在异族的统治之下^[1],而他的伟大著作也终生都未得到同时代人的真正喝彩。维柯死后多年,他的星光才逐渐将世界照亮。维柯在他生命的前半段(39岁以前)差不多沉浸于希腊罗马的古典思想资源当中,这时期他有两大导师,一位是柏拉图,一位是塔西佗。只是在39岁以后,维柯才逐渐将思想重心转移到近代,这时他遇到的两大导师,一位是培根,一位是格劳秀斯。此外,尽管他一直将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对立而贬抑前者,但维柯很多思想资源显然来自亚里士多德。尽管他根本不把笛卡尔看作他的导师,只是看作思想对手,但笛卡尔对维柯思想的影响却横贯始终。尽管维柯终身沉浸于古典思想之中,也以教授古典思想为业,但他从未脱离近代科学文化潮流。相反,由于他对古典思想的精深理解,使他对近代科学的批判更是入木三分。

纵观维柯的思想和作品,仿佛维柯就是从古典世界走出来的异客,他的思想发展好像就是逐渐与现代思想相合相融的过程。古典与现代初步结合产生的结果就是最早的六个大学开学演讲,倡导的主要是古典精神(1699—1707);而后开始对现代思想进行批判,在批判中整合古今文化资源,产生了《论我们时代的学习方法》(1708);然后进一步融合的结果竟然是用最古老的哲学智慧来解决近代思想最前沿的根本问题:

知识与真理，这是维柯融贯古今文理思想的第一次尝试，即《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第一部：《形而上学》（1710）；自1713年开始，维柯开始着手他的历史作品《安东·卡拉法的生平》，并于1717年出版，同时批注格劳秀斯的《论战争与和平法》，哲学、历史和法律开始融合；自1720年至1722年，维柯先后出版了他的拉丁文巨著《普遍法》的三个部分：《论普遍法的唯一原则和唯一目的》、《论法学家的恒定一致》和《注释》，这里他第一次采用哲学、史学和法学三位一体的方法，从法哲学的角度将古典与现代世界衔接起来，他所做的仍然是试图从古代世界去寻找整个人类世界的普遍图景，只是他的作品最终仍然落入近代以来的法学形而上学的窠臼。意识到这一点，维柯开始构思他的“新科学”。1725年，维柯先后写了两个版本的《新科学》，先是采用否定形式，但因卷帙浩繁、论述繁复而未能付诸印刷，原稿也已遗失；在同年采用肯定形式匆匆成书，此即第一版。到1730年第二版，维柯在写作体例上有了重大变化。第一版里，哲学与历史虽然在精神上统一，但形式上仍然分立。第二版里，哲学与历史就真正融合起来了。如果与《普遍法》相比，可以看出维柯思想越来越远离形而上学路线，或者不如说形而上学越来越融入，甚至消失在历史和法律当中。而第三版不过是一些增删补正，虽说对第二版有所丰富，但并无重大变化。

概要介绍

提起维柯，我们总是与他的名著《新科学》联系起来。在维柯的时代，“新科学”这个名词是极为常用的，然而能够作为“新科学”存留至今，且历久弥新的，却寥寥无几——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维柯的《新科学》当之无愧。但是，维柯的思想是如此之新，以至于维柯曾经慨叹自己的作品“犹如送入了沙漠之中”^[2]，在那不勒斯沉寂

了半个多世纪，而他自己则仿佛是一个行走在欧洲的荒原上的“新人”^[3]。直到库克的《关于那不勒斯革命的历史评论》(Vincenzo Cuoco, *Saggio storico sulla rivoluzione napoletana*, 1799), 才开始将维柯塑造为一个与他的时代“隔绝”的形象, 认为他批判了当时那不勒斯的思想革命运动, 且与当时欧洲的启蒙运动相对立; 同时他又认为, 维柯超越了他的时代, 并且是18世纪和19世纪德国文化的先驱。^[4]米什莱(Jules Michelet, 1798—1874)在他的《谈谈维柯的体系和方法》(*Discours sur le système et la vie de Vico*)中肯定了库克所描述的维柯形象, 从此开始了维柯的欧洲命运。但此时的维柯研究主要服从于当时用历史方法反对笛卡尔主义的需要, 并且将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意大利复兴时代的唯心主义者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以及《维柯全集》的编纂者尼科里尼(Fausto Nicolini)加深了这种印象。不过, 克罗齐主要是从他的唯心主义出发来解释维柯的哲学的, 他把维柯描述为自己的唯心主义的先驱。现代的维柯研究者罗西(Paolo Rossi)也支持上述关于维柯与当时文坛隔绝的神话, 他把维柯解释为一个孤独的褊狭的修辞学教授。^[5]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说, 维柯既未从18世纪的欧洲文化中吸取什么有价值的素养, 也没有教育他的同时代人, 而他自己却是一个伟大的天才, 伟大的总是让人误解。^[6]然而, 如今意大利的维柯学者们通过细致的研究梳理, 证明维柯不仅没有和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相隔绝, 而且他本身就构成了这一伟大思想运动的一部分, 是意大利对启蒙运动的重要贡献。他们证明, 维柯在哲学思想上吸取了洛克的经验论和斯宾诺莎的基于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之上的文艺复兴哲学传统, 在自然科学上也并未完全脱离当时的最新科学倾向。这方面的工作是由意大利的尼古拉·阿巴尼亚诺(Nicola Abbagnano)开山的, 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维柯研究中心贡献良多。他们也证明, 维柯思想通过各种潜在的途径传入18世纪的欧洲其他地区, 例如苏格兰的荷马研究, 西班牙的诗学研究和法国卢梭关于人类社会起源的研究等。^[7]当然, 毫无疑问, 几个世纪以来, 维柯只是在

意大利被奉为最伟大的民族哲学家，然而在意大利之外，尽管欧洲许多大思想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维柯那里——正如现代哲学史家们所肯定的，但他们并没有给予维柯足够的重视。直到“二战”以后，随着英语世界维柯著作译本的问世，才在全世界兴起了一股维柯研究热。因为人们发现，不同时代、不同学科和不同立场的思想家们都可以与维柯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甚至把维柯看作是自己的先驱。维柯的主要著作《新科学》不仅构成了近代思想史的一部分，同时还跨越了近代思想，甚至当代思想，成为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必要工具；在哲学、法学、语文学、历史学、教育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修辞学、人类学、美学等各种学科领域的研究，如果离开了《新科学》那就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甚至是最严重的缺憾；无论是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者，都能从维柯那里找到所需的资源。在维柯的思想与近现代思想的关联和文本互读上已经产生了无数丰硕的成果。从这方面来讲，维柯俨然一位现代的柏拉图。

然而，维柯思想有没有一个根本意图？如果有，那又是什么呢？考虑到这个问题，就必须对维柯思想有一个通盘的评价。意大利的维柯研究者们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这项艰巨的努力，例如《维柯全集》第一卷的编纂者法拉利(Ferrari)在该卷卷首所撰的文章《维柯的思想》(1914)以及柏拉图主义者阿科里(F. Aciri)的《维柯的观念理论》。^[8]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于维柯思想整体的研究得到了全面发展。这体现为交互相关的两条路线。这就是说，维柯研究者们不仅仅加深了维柯时代的文化背景和维柯思想产生的文化效应，而且开始突出关注维柯思想的古典来源和古典精神。前者强调的是向后的效应史，后者强调的是向前的谱系史。关于向前的谱系史维柯自己已经指明了方向，那就是他的四位作者。他将思想之根深深扎在希腊哲学中(柏拉图)，然而却更多地从罗马法和罗马史中(塔西佗)吸取营养，他要充分消化近代科学文化的宏伟发展(培根)，要通过一种唯一的理性将一切科学艺术(首先是法学)融会贯通在一起(格劳修斯)，最后他还必须为基督教文化与

异教文化找到一种共同的原则(奥古斯丁)。维柯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是笛卡尔所代表的近代性的挑战。为了对付这种挑战,维柯不仅诉诸包括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文化在内的古典思想和古典精神(早期六个人文演讲和《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而且要穷究深挖处于哲学之前的诗性智慧和哲学之外的凡俗智慧(从《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到《论普遍法》,再到《新科学》),以期重新理解和塑造近代世界和人类精神。这样,在我们面前就展现出了一幅宏伟的思想史画卷。结果证明,维柯不仅新到比现代思想还新,而且老到比柏拉图还老。如此说来,研究维柯思想就必须研究整个西方思想史和问题史。只有同时把握这两个方面,才能够真正把握维柯的思想整体。当然,要把握维柯的思想整体和根本意图,全面理解维柯的著作就是必然要进行的工作了。

对于维柯著作的理解同样存在两种方法。一种方法仍然是按照效应史的思路,把维柯思想的前后承继和关联看作研究对象;另一种方法则以对维柯的根本问题的理解为核心,通过对维柯的各种文本的全面解读,不断深化相关问题的理解。但无论按照哪一种方法,对维柯文本的全面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本书的翻译和详尽注释正是为了满足这方面的需要而做的。

编译说明

1698年,维柯通过竞选方式赢得了那不勒斯大学的修辞学教授职位,这一职位的正式职责就是要求他每年的10月18日发表一篇新学年开学典礼演说。当然,由于大学教育制度的变革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复杂变化,这一制度并没有一直传承下去。除了在维柯的《自传》中所讲到的八个演讲之外,维柯在《新科学》第二版出版之后两年又发表了第九个演讲,即《论英雄心灵》,前七个演讲在时间上连接较近,但第八演讲和第九演讲都相隔甚远。本书收集了维柯生平所作的大学开学

典礼演讲，包括早期的六个演讲(1699—1707)，第七个演讲《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1708，简称《研究方法》)，第八个演讲在维柯的《自传》中虽有摘要(1719)，但原稿已经丢失，题目《论一切知识的原则和目的》是编者根据内容摘要加上去的。^[9]第九个演讲《论英雄心灵》是在《新科学》第二版之后两年所作的(1732)。维柯自己也曾经想把前面七个演讲放在一起出版，并且用这样的标题：*De finibus et ratione studiorum*（《论学习的各种目的与方法》）。不过，只有第七演讲在作者演讲后的第二年出了单行本，不过是经过大大扩充了的，因此这个演讲比其他演讲都长得多，特别是其中论法学部分。第八个演讲虽然原稿已经丢失，但是其主要内容和观点都反映在此年所撰写的拉丁文巨著《论普遍法》的序言和概要当中，故而编者在此将两者收录了进来，以便使读者能完整地看到维柯在人类教育方面的思想发展脉络。这个演讲从其摘要中来看，可以概括为《论一切知识的原则和目的》。第九个演讲《论英雄心灵》是在《新科学》第二版出版之后，是对人类教育的一个重新思考，可以说是《新科学》在教育和政治方面的一个实践。本书选编理由基于两点，一是它们都是维柯的大学开学典礼演讲，二是它们正好都围绕着人类知识和人的教育这个重大问题来展开的。

此外，关心维柯思想发展的读者也可以从这里把捉维柯思想的来源、产生、形成和成熟，不过关于维柯的形而上学则需要再研读《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1710，简称《古代智慧》)。一般来说，六个早期演讲是维柯对于人类世界的最初探索，其中就包含了后来几乎一切重大问题的萌芽，《研究方法》和《古代智慧》就是《论普遍法》和《新科学》的材料准备、方法准备和思想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形成了维柯的形而上学；《论普遍法》开始把哲学、语文学和法学综合在一起，是对人类民族世界的自然法和普遍法的第一次伟大探索；《新科学》才把这三者真正融合在一起，特别是第二版和1744年版，代表着维柯的思想达到了完全的成熟。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可以看到各种古代思想和近代思想之间进行着激烈的交锋，无论是从教育哲学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哲学史和思想

史的角度来看，都是那么地荡气回肠，他的开创性道路一直延伸到了当代的心灵和精神，等待着我们来重新阐发。

本书还突出了维柯研究的另一条道路，那就是通过人的教育问题来贯通维柯的思想发展和问题意识。在这里尤其适用上述维柯研究的第二种方法，也就是通过文本互读来逐渐深化对维柯的主导问题的理解。本书的内容说明了教育哲学的兴趣贯穿了维柯思想发展的始终，而这个问题恰恰和柏拉图思想的旨趣与意图相互照应。一般认为，维柯在早期演讲时期关注的是人类的个体教育问题，在《新科学》时期关注的则是人类的民族教育问题。由于维柯是遵循着人类的发育次序来思考人类教育问题的，通常就说维柯是从早期的人类个体发育理论过渡到后来的人类群体发育理论的。维柯的人类个体教育问题就反映在他的全部演讲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演讲已经具有非同寻常的独立意义。如果考虑到上述问题意识和阅读方法，维柯的人文演讲的意义将得到进一步加深。一方面，从人文演讲来看《新科学》，很清楚的，它的主导线索就是教育和人性，正是通过这一点维柯才把古典和现代、哲学与历史完美地联结起来，而契合点就在于立法和释法的审慎智慧。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新科学》之后的第九个演讲来看全部开学演讲的话，可以说它们都是基于基督教背景下的理性时代的人的图像，面临的共同任务都是如何维护人类文明，使之不致遭受第三轮野蛮回归的腐蚀，培养全面的人和全面的公民。有了这个判断，立刻使我们免除了对维柯人文演讲的流俗理解。从这一点上来看，也很容易与维柯时代的三大教育思潮区别开来：人文主义的教育哲学、笛卡尔主义的教育哲学和耶稣会的教育哲学。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有两种基本形式：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 1494—1553)的以知识本身为目的的知识形式主义和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1469—1536)的以文学审美为目的的文学形式主义，他们和维柯一样都强调知识整体和古典文明，然而和维柯的公民教育——包括公民智慧和公民德性——却截然不同。据此，这里所讲的人文教育必须和人文主义的教育区别开来，或者说维柯

的人文教育思想是一种新人文主义的教育。^[10]同理，笛卡尔主义的教育讲究的是清楚分明的观念和思维程序，可以说是某种理智形式主义。耶稣会的教育方式和教育体制无疑对维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的一点就是，耶稣会的教育首先是基督教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目标是为了培养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毫无历史感地利用各种希腊罗马的古典资源。反映在维柯那里，就是如何处理宗教教育与公民教育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至于当时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而出现的实验经验的教育路线，同样也应该纳入到公民教育这个主导线索中。

维柯的教育哲学

早期六个人文演讲在作者生前均未面世，仅仅在 19 世纪才出现，于 1868 年由格拉索(Galasso)整理出版。在此之前，人们对于这六次演讲的认识仅限于维柯在《自传》中通过并不完全忠实的摘要所做的介绍。坎托尼(Cantoni)曾在 1867 年写过一部维柯专著，但直到 1870 年他对维柯六个人文演讲只是用下面这番简评草草打发了事：维柯的人文演讲没有包含任何“很新鲜的东西……也没有得出任何结论”，而且“也没有脱离成千上万的开学演讲的流俗话语”。^[11]直到 1884 年，弗林特(Flint)才开始重视维柯在早期人文演讲中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探讨维柯哲学思想的诞生情况。^[12]而后和克罗齐齐名的意大利哲学家坚蒂莱(Giovanni Gentile, 1875—1944)主要从维柯当时的思想环境上来考虑维柯思想的形成情况，他揭示了早期演讲的人文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背景。^[13]相反的解释方向反映在科尔萨诺(Corsano)的专著《文艺复兴和宗教在维柯那里》，他认为，如果我们要认识到早期演讲的重要性，就不应该仅仅关注它们在维柯思想发展中的作用，而应该关注它们对于古典修辞的品位和模仿，特别是西塞罗。^[14]由此，对于早期演讲的关心至少可以从下面几条线索来看：它的古典源泉，包括苏格拉底、

柏拉图、西塞罗和昆体良；它的近代源泉，包括新柏拉图主义、笛卡尔主义和伽利略为代表的实验自然科学；它对于维柯后来思想发展的作用；它的独立意义也包含在它的人文教育思想中，从这个角度可以考察的就是在当时的人文主义教育、笛卡尔主义教育、耶稣会教育等教育思潮中，维柯的教育哲学有什么样的独特意义。关心这些问题的读者朋友们要留心本书中丰富的注释，它们提供了这方面研究的大量资料。

在早期演讲中，前三个演讲讨论的是学术研究的人性目的，第四个、第五个演讲讨论了学术研究的政治目的，第六个演讲讨论了学术研究的基督教目的，合起来就是学术研究的目的这个课题。从第六个演讲开始，维柯就过渡到了学术研究的内容和次序问题。^[15]第六个演讲是尤为重要的一个桥梁。它将前面五个演讲的内容综合在一起，发展出了教育的几个原则：第一个是人性原则，教育必须符合人类的本性，必须在人类本性的基础上培养更为完善的人性，这个问题就是从第一个演讲的主要论点开始的：认识你自己。从人性这方面来看，第一个演讲讨论人的神圣本性，第二个演讲讨论人的愚蠢本性，第三个演讲讨论人的无智本性，第四、第五个演讲讨论人的社会本性，第六个演讲讨论人的堕落本性，并且在第六个演讲中，一切人类本性就表现在人的神圣本性和堕落本性这两股张力之间，而社会性则贯穿始终。第二个是公民原则，在这个原则下面要求培育的就是在理性时代中的智慧公民，每一个公民都要培养出真正的公民智慧和公民德性。公民都有双重国籍：普遍城邦和国家城邦，相应的公民智慧和公民德性就是其公民权。第三个是整体智慧原则，它要求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公民都要利用人类智慧的所有方面全面培养语言、心灵和精神的各种能力，改正这三个方面的堕落本性，因此，这个原则实际上要求的是用整体的智慧来培养整体的人和整体的公民。从这方面来讲，智慧就包括雄辩、知识和审慎，分别培育人的语言、心灵和精神。第四个是人类个体的发育次序原则，也就是学习研究的各项目和各项内容必须从人类个体不同发育阶段的不同自然本性出发来安排，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个体的精神教育